

# 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研究（1949—1966年）<sup>\*</sup>

郭惠杰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文化产业系，福建福州350117）

【关键词】归侨；体育史；竞技体育；体育人才；体育发展；跨国活动

【摘要】论文选取1949—1966年间的归侨体育人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群体的形成原因、群体的基本特征、主要贡献，力图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治力量、侨务政策、社会经济变迁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归侨竞技体育人才所承载的特定历史使命、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面对社会转型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海外华侨华人体育人才与中国发展之关系。归侨体育人才群体的形成，主要缘于国家动员形成的巨大拉动力量、东南亚局势动荡促成的外在推动力量，以及国家认同形成的强大精神力量；群体的规模与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回归时间峰值化、空间特征区域化、回归通道社团化、来源构成多源化等特征；群体的贡献与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扮演的多重角色：首先，筚路蓝缕，成为推动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特殊海外力量；其次，言传身教，成为指引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幕后英雄；最后，在“文革”中，他们开始跨国流动，走向更为广袤的空间，推动了竞技体育在更大范围的传播与交流。

【中图分类号】D6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6)02-0061-08

## A Study of the Sports Talents among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1949—1966

GUO Hui-jie

(Concord College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Key words:**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the history of sports; competitive sports; sports talent; sports development; transnational activities

**Abstract:** This paper is focus on the sports talents among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rom 1949 to 1966, and analyzes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roup, with an attempt to appreciate its positiv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y placing this group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to which overseas Chinese sports talents had contributed over the time. Du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turned sports talents had a special historical mission, as they were being placed under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forces, state's policy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facing the difficult choices between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The formation of the returned sports talents was rooted in the strong pressure of the state mobilization, the instability of Southeast Asian politics, and the spiritual power of the national belonging. And its development had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which are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as the peaking of the returning time, the

【收稿日期】2016-02-17；【修回日期】2016-04-17

【作者简介】郭惠杰（1977—），男，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体育史。

\*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13CTY013），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真诚感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localizing of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 the communal grouping , and the multiplying of origins. The contribution and value of this group are embodied in their multiple roles: first , they became the special force tha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New China; Second , they brought their knowledge and coached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of Chinese sports talents; Lastly ,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y moved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 and moved to a broader international space , where they played a greater role of broadening cultural exchanges.

新中国成立之后，海外华侨欢欣鼓舞，一大批有志之士纷纷归国效力。其中，一批批华侨竞技体育人才，冲破重重阻力回归祖国，为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做出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爆发的17年间，是海外大量体育竞技人才回国的重要时期。这17年间的归侨体育人才，构成了一个特殊又常被忽视的群体。由于各种因素，他们的贡献与价值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与客观的评价，其精神中蕴含的时代价值也没有得到相应的阐发与揭示。一些研究涉及了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提供了生动、丰富的个案，如方雄普<sup>[1]</sup>、若雪<sup>[2]</sup>、蔡扬武<sup>[3]</sup>等对吴传玉、汤仙虎、许承基等华侨体育人才的个体成长、发展背景、主要事迹、历史贡献做了翔实的梳理与推介；梁英明<sup>[4]</sup>则以陈福寿的经历为主要线索，回溯羽毛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历史及归侨所发挥的作用。但整体而言，目前有关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的研究略显零碎与松散，从群体研究的角度作整体考察的仍不多见。重新认识建国初期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的历史贡献，挖掘其丰富的思想蕴含，对建国初期归侨体育人才群体的研究，对于丰富华侨华人专业人才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本文选取1949—1966年间的归国华侨体育人才作为研究对象，以进入国家队或执教省队以上为基本标准，整理出归侨运动员和教练员共计83人。之所以这么选择，主要基于如下考虑：首先，目前对华侨与体育发展的研究较少聚焦于这个时段，从群体的视角审视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的研究成果更是付之阙如。其次，在1949—1966年间，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海外华侨竞技体育人才出现回流高峰，形成了特殊的社会群体，对新中国体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之前，尽管也有一些海外华侨体育精英如许承基、李惠堂等或回归故里，或荣耀于国际竞技舞台，但终究是一种零星现象；至于1966年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新中国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海外华侨竞技体育人才的回归也基本中断。当今时代，全球化大潮席卷世界各地，体育移民引发的竞技体育人才的跨国流动现象正引起新的关注。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不仅仅引进体育人才，还向外输出体育人才，如海外乒乓球兵团。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在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起步阶段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归侨群体。

## 一、拉力与推力：群体形成的原因

“追溯历史过程，并非为了阐述某种既存现象，而是试图更好理解历史选择背后的内在动力。”<sup>[5]</sup>在历史的长河里，关键时间节点和偶然性往往对于历史发展的轨迹具有重要作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海外华侨竞技体育人才回流现象的深层探索，必须定位于特定时空坐标，重返历史现场，厘清隐藏于表象之后的隐秘逻辑。

### （一）国家动员：形成拉力

建国伊始，体育事业百端待举。其时国内物质条件一般，竞技体育水平也尚处于起步阶段。新中国体育管理层对此有清醒认识：“旧中国的体育运动基础薄弱，而现在我国的运动成绩虽然稍有提高，但离国际水平很远，因此在历次国际体育活动中皆形成我国体育运动水平与我国家地位不相称的情形。”<sup>[6]</sup>1952年，贺龙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上任不久，

他便明确提出“东亚病夫的帽子一定要摘掉”。<sup>[7]</sup>同时,新中国宪法规定“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和利益,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利和利益”。<sup>[8]</sup>这种明确的信号,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投入新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洪流中。显然,国家动员对归侨体育人才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

海外体育人才对于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与普及的价值与意义,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早已洞悉。其担任体委主任期间,积极物色海外体育人才,广纳群贤。为了发展新中国棒球事业,贺龙积极动员梁扶初“你是棒球专家,才真识广,希望在你指导下,把部队和全国棒球搞起来。”吴传玉被选为新中国运动员中的第一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就是经由贺龙提议的。贺龙还先后从香港招募傅其芳、容国团等乒乓球名将,为后来中国乒乓球的长盛不衰奠定了基础。<sup>[9]</sup>

显然,对海外体育人才资源的吸收与利用,并非个人之举,而是国家层面的一种决策和共识。苏联归侨田径教练黄健等人,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归国效力之心。毛主席给予了回复“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sup>[10]</sup>荣高棠在民主德国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上,寄语郭德观教练(印尼归侨)“希望你们有一天能回祖国看看。”<sup>[11]</sup>这是华侨教练郭德观与新中国体育界的初次接触,也促成了日后其携弟子吴传玉(游泳)、高宏远(网球)等体育人才归国效力之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不少海外华侨持观望态度。如何打消疑虑,广纳优秀海外体育人才归国效力,成了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1953年,在方定坝、丁子才组织并率领下,印度尼西亚华侨体育观摩团一行15人回国参加篮球、排球、网球和羽毛球四项运动会。<sup>[12]</sup>查阅福建档案馆资料发现,这次回国观摩、学习的全体队员共51人,<sup>[13]</sup>其中就包括后来新中国羽毛球事业奠基者王文教等人。显然,在这次长达几个月的回国观摩之后,一方面,他们深切感悟到新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落后现状;另一方面,他们感动于新中国对体育人才的求贤若渴。<sup>[14]</sup>王文教、陈福寿等海外华侨体育人才由此冲破重重阻力,毅然踏上归国效力之路。显然,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政府以国家力量发出感召海外华侨归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信号,将国家意志嵌入到动员海外资源的行动中,形成了巨大的拉动力量。

## (二) 住在国的变革: 促成推力

1951年,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联欢节大会在民主德国柏林举行。其间,印尼国内政局发生动荡,印尼体育代表团团长郭德观此时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和荷兰等国代表团,纷纷邀请印尼华侨运动员到他们国家发展。中国代表团也积极争取,极力动员印尼代表团中的华侨运动员回归新中国效力。经过慎重考虑,郭德观率领印尼华侨体育代表团中的六七十名华侨,回到了首都北京。<sup>[15]</sup>

1954年之后,东南亚部分国家排华情绪甚嚣尘上。1959年,印尼爆发了大规模的“排华潮”。“大概1960年前后,那段时间,印尼发生严重排华事件,一些原来就在印尼打得有名气的羽毛球队员,像汤仙虎、侯加昌、丘玉芳、陈玉娘、梁小牧、陈天祥、方凯祥、吴俊盛、颜存彩、郑青金等等,后来陆陆续续就回来了,大部分都到了福建和广东羽毛球队了。”<sup>[16]</sup>印尼这场“排华”风波,无意中助推了大批竞技体育青年人才的回归,为新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补充了后备力量,注入了新鲜血液。

## (三) 国家认同: 精神动力

爱国精神和民族传统历来是海外华侨爱国主义的历史渊源。<sup>[17]</sup>新中国的归侨体育人才,冲破种种阻力,克服各种困难,归国效力,其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回国后,面对国内竞技体育的积贫积弱,他们胸怀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勤学苦练,团结奋斗。“我把命豁出去了,一定要为国家多培养优秀运动员,争取创造更好的成绩。”(王文教语“每次出国比赛,都受到海外侨胞与外籍华人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想起这些我们就会更加热爱祖国。”(侯加昌

语 “谁都想过好日子，但我们要强调奉献精神，要有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牺牲的精神。”（林慧卿语）<sup>[18]</sup> 如此坚定的信念和爱国精神，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极大影响了当时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的选择与行动。

国家认同与爱国情怀固然是华侨体育人才回归的主要精神动力，但是，对自身职业发展空间的考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在动因。陈福寿提及 “我们感觉到了新中国对体育的重视，而且国内羽毛球的水平非常低，如果我们回来应该是会有一番作为的。”侯加昌归国前，在印尼已颇有实力，但因坚持中国国籍，在印尼的职业发展遇到了很大瓶颈。“印尼筹办青少年集训。本来，听说我的名字在集训名单上，不料，当他们得知我持中国国籍时，就将我除名了。我非常气愤，这分明是对华人尤其是对中国人的排斥，我内心萌发了一个强烈愿望：总有一天，我要代表中国打败印尼。”<sup>[19]</sup>

廓清社会变迁与新中国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形成的逻辑关系，实质上是从社会变迁和动力机制视角深入追问这个特殊群体 “从哪里来” 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构成了进一步阐发归侨群体结构形态和社会价值问题的基础。<sup>[20]</sup>

## 二、规模与结构：群体的基本特征

### （一）时间特征：峰值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海外华侨体育人才大批回归的时间特征大致表现为两个 “回归高潮”。第一个回归高潮是 1951 年至 1958 年间，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游泳界的吴传玉、戚烈云，羽毛球界的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安宁，乒乓球界的容国团、姜永宁、傅其芳等。他们不仅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技能，而且身体力行，或星星之火，点燃竞技体育发展的火炬；或奠定基础，形成项目优势，推动整体水平的快速跃升。实际上，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的回归现象，如同代际的交替，总是有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其间有高潮，也有低谷。导致此种变化的原因是，随着 1955 年中国与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签订，印尼华侨的国籍选择问题得以明确，回归人数明显回落。但随着 50 年代后期东南亚局势的动荡，尤其是印尼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华排华行动，又形成了第二次归国高潮。1958 年至 1961 年间，羽毛球界的汤仙虎、方凯祥、侯加昌、傅汉询、吴俊盛、张铸成、薛从良，乒乓球界的林慧卿、陈盛兴，网球界的高宏运、高宏谋、许淑莲、曾精雄、沈美镇等一批体坛新星先后回到祖国。<sup>[21]</sup>

从时间特征看，回流高潮与低谷的周期变化，都与重大的政治事件、时代氛围的演变息息相关。如果说第一周期的回归高潮主要蕴含了自发自觉的 “体育报国” 的内在爱国主义情怀，那么，第二周期的回归高峰则体现着政治因素引发的外部强大推动力量。

### （二）空间特征：区域化

历史演进往往又是一种多向度的发展。<sup>[22]</sup> 海外华侨竞技体育人才跨国流动现象，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影响因素。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两次回归高潮，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那么，以祖籍广东和福建为主体的归侨群体的构成，则集中体现了群体汇聚的地缘区域特征。从空间布局来看，基本以东南亚地区的回流为主。此间缘由大致如下：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与资本主义扩张形成的跨民族、跨文化传播中，西式竞技体育随之传入东南亚地区并不断兴盛，羽毛球等项目在印尼和马来亚等地具有较高的竞技水平。随着归侨竞技体育人才归国效力，同样推动和促进了特定竞技项目在新中国的发展。这一传播过程大致遵循着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区域传播的规律，海外归侨竞技体育人才充当了传播的媒介与桥梁，发挥了内联外引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竞技体育的空间传动与横向拓展。

### （三）回归通道：社团化

值得注意的是，闽粤华侨体育社团组织成了输送海外体育人才回流的特殊通道。众所周知，

闽粤华侨素有结社传统，由于早期闽粤华侨的“连锁迁移”导致的明显区域性特征，使得海外华侨在东南亚等地往往以血缘、地缘关系而结社。住在国的闽粤籍华侨普遍通过组织体育社团，共同致力于发展海外华侨体育运动。其中，体育社团的“执事关联”现象突出，就是多个体育社团聘任同一人士担任关键职位，产生交叉影响，形成密切交往的通道。<sup>[23]</sup>比如郭德观、林丰玉等归侨教练在海外的中华网球协会、中华足球协会、中华游泳协会、中华羽毛球协会等诸多体育社团组织担任要职，培养与输送了大量华侨体育人才归国效力。再如游泳明星吴传玉的成长，就是得益于印尼华侨组织中华游泳会的培养。1947年，由闽粤华侨推动成立的香港中华业余游泳联合会，于20世纪50年代输送了多位运动员回归祖国参与游泳训练，其中有后来担任中国游泳协会副主席的陈嫣屏、创百米蛙泳世界纪录的戚烈云以及皆入选当时国家队的黄潭胜、黎焯华、黄阜岫等。<sup>[24]</sup>容国团父亲从日本到香港发展，在香港组织工联会工作，容国团的乒乓球生涯从香港工联乒乓球队起步。此外，1953年，以闽粤籍为主的印尼、缅甸华侨体育团组织了访华体育交流，更是促成了多名体育名将的回国效力。<sup>[25]</sup>

#### （四）来源特征：多源化

其一，体育精英。一些华侨体育人才在归国之前，在侨居地已经颇有实力，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如1954年回国效力的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归国前曾获得印尼羽毛球单打冠军，同期回国的陈福寿也是当时印尼羽毛球国家队主要成员；黄强辉归国前就曾两次获得印尼的全国健美冠军。<sup>[26]</sup>这批归侨体育精英的加入，夯实了部分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基础，提升了整体实力。其二，后起之秀。一些海外华侨在侨居地业已展露出良好的运动天赋。如丘基金高中时就获得万隆市自行车比赛第三名；泳坛新星符大进在1955年获得印尼全国冠军；侯加昌、汤仙虎作为后起之秀，曾代表印尼国家青年队到国外参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前期回归的体育精英形成的示范效应，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随后以后起之秀为主体的第二次回归高峰，优化了梯队结构，为新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其三，归国侨生。新中国为了解决华侨子女入学问题，在闽粤设立了部分华侨补习学校，一些归国侨生的体育天赋也逐渐于新中国的竞技体育舞台得以展露。其中部分具有运动天赋和专业基础的侨生进入了专业体育院校或专业队，受到系统培养，体育才能得以发挥。仅福建厦门的集美侨校，1953—1965年，就为国家输送了10名运动健将，35名一级运动员，90多名运动员。<sup>[27]</sup>

### 三、多重角色：群体的主要贡献

归侨体育人才作为一个特定群体，其作用和意义显然不应囿于“个体贡献”这样的狭隘视野，而应与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赋予群体以别样的价值感、历史感和力量感。整体而言，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通过自身不懈努力，身兼多重角色，努力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 （一）筚路蓝缕：推动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特殊力量

##### 1. 身体力行：技术效应

当个别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的名字分散、湮没在零散庞杂的史料之中时，不会引起多少关注，但是，将其汇聚为一个群体，则具有震撼效应。据统计，从1956年到1979年的23年间，在历届全国及国际性羽毛球锦标赛中获得前3名的运动员中就有44人次系归侨运动员。<sup>[28]</sup>印尼归侨吴传玉1953年赴罗马尼亚参加首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夺得冠军，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金牌。正是多名归侨游泳人才的加入，1955—1966年，广东的竞技游泳水平遥遥领先于全国水平，其中代表性人物有戚烈云、符大进、王敬良、张木龙、张天辉等人。戚烈云独特的“高航式”蛙泳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在广州打破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成为中国打破世界游泳纪录的先驱者。北京棒球队在新中国第一届全运会上获得了冠军，李敏宽、颜平安等7位旅日

归侨占据了北京队的半壁江山。<sup>[29]</sup>大量日本归侨的加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新中国的棒球水平。在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里塑造一个世界级的棒球强队,日本归侨体育人才创造了一个奇迹。<sup>[30]</sup>闽粤羽毛球运动步入正规化训练肇始于多名归侨运动员的加入,当时形成了主要以归侨王文教的“扣杀型”和陈福寿的“拉吊型”为代表的技术风格。总之,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形成了某些优势项目,推动了技术革新,引领了技术创新。

## 2. 普及提高: 扩散效应

除了努力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归侨体育人才还致力于推动竞技体育项目多维度的普及与发展。首先,以羽毛球为例。1955年,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4位福建籍归侨运动员回省表演,对推动福建羽毛球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sup>[31]</sup>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羽毛球运动无论是训练质量方面,还是技战术创新层面,均大幅下滑。归侨群体充分利用跨国信息和资源优势,推陈出新,把东南亚羽毛球运动的先进技术和新颖打法与中国传统的步法、力量优势结合起来,内外交困的新中国羽毛球运动始终得以保持较高竞技水平。归国侨生体育人才对学校体育尤其是侨乡学校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侨生陈丽娟获得全国女子羽毛球冠军,厦门拳击队主要队员陈伟勇、冯干、詹景文、云昌浩、李存、吴政材、黄建国、许荣源、黄伍初等均为归国华侨学生,被誉为“侨生拳击队”。<sup>[32]</sup>“侨生不仅给侨乡带来了体育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新项目等信息资源的传播,而且还为侨乡体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人力资源支持”。<sup>[33]</sup>先进的体育装备对竞技体育水平提高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前我们都穿国外牌子,后来国家提出搞国产器材,过来征求意见时,王文教、汤仙虎他们提出把鞋底花纹做成人字形的,内侧鞋面上加一块防摩擦的胶皮,这个设计对摩擦抗滑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sup>[34]</sup>显然,由于经历不同文化的洗涤激荡,归侨体育人才更易冲破传统训练思想的禁锢,提出技术革新之道。在当时,这为新中国竞技体育运动发展突破封锁另辟蹊径,起到了鸣鼓开道的作用。

## 3. 砥砺德行: 示范效应

在新中国竞技体育蹒跚起步阶段,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用“第一块金牌”、“第一个世界冠军”、“第一个世界记录”的优异表现,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对此,习近平曾给予很高评价:“回想1957年,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便曾目睹戚烈云打破了1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而同样是香港出生的国家乒乓球手容国团,在1959年赢得世界乒乓球冠军”。<sup>[35]</sup>榜样不仅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面旗帜。游泳名宿穆祥雄对此深有感悟:“我国游泳运动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五十年代游泳方面的吴传玉(印尼归侨)带出了一批人,提高了游泳运动的水平。”<sup>[36]</sup>同样,陈运鹏(原国家游泳队总教练)在1948年民国第七届运动会中观摩了吴传玉的表演后,极为兴奋,备受鼓舞,视其为学习的偶像。<sup>[37]</sup>他们在竞技体育领域的出色表现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接见了多位归侨竞技体育人才。1959年为新中国夺得首个世界冠军后,容国团更是不经意地被推到了国家荣誉的顶峰。他和同时代的吴传玉、戚烈云、王文教等人,共同树立了归侨体育精英国家英雄的形象。

归侨竞技体育人才推动新中国竞技体育传播与发展的方式是丰富而多元的,产生的影响是深入且有效的。归侨不懈努力与扎实的工作作风,充盈着激情与梦想的坚定信念,为新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发展与提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宏观而言,归侨体育人才群体的形成,既与特定的历史进程有所关联,又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如若以大历史观重新加以审视,不难发现,当一个国家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往往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新中国成立的巨大社会变迁,带给归侨体育人才群体更多的进入国家竞技体育公共空间的际遇,使其有机会投身于新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建设的洪流,亦使之自觉肩负起推动特定运动项目迅速提升与持续发展的历史重任。

### (二) 言传身教: 指引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幕后英雄

影响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因素是多维且综合的,归侨教练是其中颇为特殊却往往被忽

视的影响因素。事实上，归侨教练对于推动和引领某些特定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中，既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归侨教练，如郭德观、林丰玉等，也有一些人完成了角色转换，从为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奋力拼搏的运动员角色蜕变为教练员，如黄强辉、王文教等。总的来说，归侨体育教练始终以培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推动新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为己任。

### 1. 培育英才

海外华侨体育精英的回归潮流中，涌现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职业教练。如果说吴传玉、容国团等归侨体育精英以优异竞技成绩在新中国竞技体育大舞台绽放耀眼光芒，那么，归侨教练则是推动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幕后英雄，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羽毛球领域，在闽粤多位归侨教练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羽毛球在世界重大赛事中夺得 59 个世界冠军。不但极大提升了地方羽毛球竞技水平，影响还上升到国家层面；游泳方面，黄焯荣等人从香港归国后任广东游泳队教练，引入了黄潭胜、陈嫣屏、黎灼华、戚烈云等天赋极高的运动员，极大地推动了广东游泳运动的发展。归侨游泳教练涂广武，更是培养出了穆祥雄等具有世界水平的优秀运动员；乒乓球领域，梁焯辉归国后担任中南队教练，陆汉俊、王友信、薛绪初等归国后任华东队教练，为广东地区培养了大量乒乓球专业人才。<sup>[38]</sup>

### 2. 薪火传承

职业体育毕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归侨体育精英终究还是要从竞技场域的舞台渐次走向幕后。于是，归侨体育精英结束职业生涯之后，开始了薪火传承的教练生涯，为新中国培养后备体育人才奉献力量。尽管对于他们而言，这种角色转型过程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必然有一个磨合与交融、摸索和锻造的过程，但是他们最终义无反顾地投向这股大潮，将自己的人生融入其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容国团等退役后先后执教于中国乒乓球队；刘晓征退役之后作为特殊技术人才引入厦门，培育了大量后备人才；戚烈云等退役后进入国家游泳队执教，培养了高埴卿等优秀运动员；陈耀光退役后培养出亚洲游泳冠军严红等多名优秀运动员；黄强辉则培养了多位世界举重冠军；李敏宽退役后担任国家女子垒球主教练；黄健培养出了郑凤荣和倪志钦等世界级田径运动员。

### 3. 著书立说

新中国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的影响非常广泛，其中一项尤为重要的任务是传播与推介，而著书立说无疑是最为有效和直接的方式。长期的海外生活背景，加之长期接触西方体育先进的技术和信息，在对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翻译和讨论中，他们更能推陈出新，准确译介和表述现代体育运动的精神和内涵。大量研究表明，东南亚早期华侨迁移网络往往由地缘、业缘、血缘等纽带关系联结，通过这种特殊媒介，“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sup>[39]</sup>譬如，傅其芳与梁焯辉合著了十万字的《乒乓球训练法》一书，为新中国乒乓球运动的训练提供了科学指导。归侨教练还广泛利用海外社会关系网络，积极译介了大量从国外寄来的体育报刊和文献资料，及时提供竞技体育技术发展的前沿信息动态。比如郭德观面对新中国徘徊不前的网球水平，积极上书国家体委，以开阔的视野冲破桎梏，提出新中国网球明晰的改革与发展思路；被誉为“棒球之父”的日本归侨梁扶初，怀揣“望三五年后，棒垒球运动能普及全国”之期冀，身体力行，大声疾呼，积极推广棒球运动，自筹经费出版《棒垒球指南》，分赠有关大中学校。<sup>[40]</sup>

### 4. 以侨为桥

归侨体育精英的回归行为不可避免嵌入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其回流之举蕴含着各种复杂因素，地缘文化和社会网络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处选择归侨教练郭德观和林丰玉为案例，以点带面，勾画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的群体交往图。作为最早一批归国的全才教练，郭德观曾分任多个印尼华侨社团组织的体育协会主席、顾问和教练。他以特殊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与归侨体育人

才群体的大多数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网球的许承基和高宏谋、羽毛球的王文教和陈福寿、游泳的吴传玉等均与其有过师生之缘。<sup>[41]</sup>后来,在他的影响与鼓励下,一批同样来自闽南地区的海外体育精英陆续回到祖国,形成了第一波回流高潮。而在第二次回归高潮中,林丰玉教练则是一个关键人物。早在 50 年代初期,林丰玉已是印度尼西亚全国羽毛球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且多年从事的体育新闻工作,同时致力于当地华侨体育社团公益事业。因此,掌握了大量信息,对印尼华侨的体育人才情况极为熟悉。林丰玉“羽球报国”口号形成了强大的感召力,1958—1965 年间,第二批归侨竞技体育人才如汤仙虎、侯加昌等先后从印度尼西亚陆续归国。通过他们的不懈坚持和内引外联,吸引了大量海外体育人才,为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注入新鲜力量。事实上,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部分归侨体育人才被调到全国各地充当教练,对于全国竞技体育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同样意义非凡。此外,归侨体育人才群体还致力于推动竞技体育项目的全球传播与交流。如原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的日本归侨王英兰,归国后长期从事中日体育交流,为中日民间交往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推动对外体育交流方面,羽毛球项目的贡献尤为突出(见下表)。

部分归侨羽毛球教练技术援外情况(1965—1979)

姓名	时间	地点	方式
林丰玉	1978—1979	瑞典、澳大利亚	讲学培训
汤仙虎	1978—1979	印度尼西亚	执教
林建成	1977—1978	尼日利亚	技术援外
陈守信	1965—1966	缅甸	技术援外
张铸成	1965—1966	缅甸	技术援外
刘晓征	1978—1979	朝鲜	技术援外
郑青金	1978—1979	尼日利亚	执教
陈玉娘	1978—1979	泰国	执教

资料来源:福建羽毛球协会编《纪念福建羽毛球队建队三十五周年 礼赞三十五年特刊》,香港美德印务公司,1991年,第40~43页。

总体看来,由于特殊的成长经历,归侨教练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良好的国际视野与外语能力以及联结海内外的跨国社会网络资源。正是通过他们的内联外引,一方面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另一方面,引介了一批优秀海外竞技体育人才,为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同时,通过技术援外,推动了竞技体育项目的全球传播与交流。虽然归侨教练群体主要扮演了幕后英雄角色,其影响并非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他们在技术引入、体育人才引进、后备力量培养、信息交流和精神激励等方面的贡献,从物质、制度乃至思想层面,逐步深入,薪火相传,完成了从个体成就向群体力量的巨大转变。在特殊年代,其对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影响与意义,由此彰显无遗。

### (三) 跨国流动: 推动竞技体育更为广泛地传播与交流

“文革”时期,新中国竞技体育欣欣向荣发展之景象悄然在政治的幡然大变中走入困境。归侨体育人才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历程也随着政治风云跌宕起伏。在这种世运推移里,满怀爱国热情的归侨竞技体育人才,内心无疑充斥着压抑和焦灼。1968年5月开始,体育界开始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体育职业和海外关系的双重影响,最终对归侨体育人才形成了巨大冲击。容国团、黄健等被扣上“海外特嫌”、“苏修特务”等莫须有罪名,其余多数人被下放到偏远山区进行“革命改造”。根据刘晓征的回忆,“当时政策规定华侨运动员在国家队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12%。”这对以归侨为主要构成的国家羽毛球队影响极大,深受“海外关系”之扰,一些人甚至无奈提交了离国报告。<sup>[42]</sup>其中一部分人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开启了跨国流动模式,重寻个人最优化的发展路径,他们或重回住在国,继续体育职业生涯;或另辟蹊径,迁往他乡,走向更



为广阔的天地，以各种形式延续职业生涯，推动竞技体育国际范围的交流与传播。如郑青金辗转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从事羽毛球教练工作；网球名将高宏谋则回到香港执教；梁秋霞重回印尼后，培养了王莲香、张海丽等世界级羽毛球名将，促进了中国和印尼的体育交流；游泳名将符大进迁居香港后，先后执教于九龙塘会、东方会、官塘游泳队等，为香港培养了大量游泳后备人才；林慧卿随丈夫移居香港，成为香港乒乓球队教练，在英联邦乒乓球大赛中，率领香港队囊括七项冠军；汤仙虎的教练生涯更是辗转往返于中国和印尼之间。归侨体育人才不断的跨国流动，有力推动了羽毛球等竞技体育运动更大范围地交流、传播与发展。

“文革”后期，随着政治风向标的再度转变，海外关系重新演变成可资利用的“海外资源”，许多归侨竞技体育人才开始寻求角色变换，发挥桥梁作用，积极推动体育内外交流。譬如，乒乓球世界冠军林慧卿担任中国侨联副主席，利用其世界冠军和华侨身份的双重影响力，积极推动海内外体育交往。陈耀光担任广东江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常务副会长，致力于各种社会体育公益活动。戚烈云担任全国青联副主席与香港中华业余游泳联合会名誉会长职务，促进两地青少年的体育交流。总的来看，尽管多数人因年龄等多种原因从竞技舞台渐次回归于平静的现实生活，但一定程度上他们对中国体育发展的特殊使命仍然还在延续。

#### 四、结语

开拓者的足迹是历史前进的起点。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不仅在各自专业技术领域融汇中西，成为羽毛球等特定项目的奠基者和拓荒者，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奋勇拼搏与砥砺德行，成为推动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股特殊力量。“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光流转，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国的归侨竞技体育人才虽然已经淡出历史舞台，但是，在特殊年代，他们开拓了新中国竞技体育的一片新天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

从历史的纵向剖面上看，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的发展轨迹生动地折射出建国初期竞技体育事业发展变迁的景象；就历史发展的横断面而言，却又鲜活再现了归侨体育人才所处的历史时代场景。新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基本是在政治变迁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曲折前进的。特定的时空坐标使得新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难以完全遵循应有的内在逻辑与连续性。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脚步被并入了政治轨道，国家对体育人才的求贤若渴，同样也为归侨竞技体育人才提供了一个人生大舞台，其力量与个性，在特殊历史时代的展演中得以彰显。

历史中有时蕴含着走向未来的答案。建国伊始，大张旗鼓、立场鲜明的国家力量的动员，完成了归侨体育人才群体形象的建构。“文革”中，“海外力量”逐步演变为“反动关系”，群体形象由此消解；改革开放后，“海外关系”的拨乱反正，群体形象得以重塑。其中始终贯穿了一条政治的隐秘逻辑。本文通过对归侨体育人才群体回归的历史背景、特殊贡献、回归动因等问题的深入考察，力图呈现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政治力量、侨务政策、社会经济变迁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归侨竞技体育人才所承载的特定历史使命，从中可领略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面对社会大转型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等；亦可洞察不同历史时期海外华侨华人体育人才与中国发展之关系。同时，对于当下全球化背景下方兴未艾的国际体育移民现象、竞技体育人才跨国流动问题，期冀本文的探讨亦能有所启示。

#### [注释]

[1] [28] 方雄普 《华侨华人与体育杂谈》，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76~77页。

[2] 若雪 《汤仙虎：再造羽坛灿烂星光》，《侨园》1998年第1期。

[3] 蔡扬武 《旧中国网坛三位华侨球星》，《体育文史》1989年第3期。

[4] 梁英明 《誉满羽坛，功载史册——献身羽毛球事业的归侨陈福寿及其伙伴们》，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

- 限公司，2008年。
- [5]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7.
- [6]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年，第8页。
- [7] 江正茂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亚运前夕怀念贺龙同志》，《人民日报》1990年6月21日。
- [8] 庄国土 《新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的变化（1949—1965年）——新中国政府侨务政策研究之一》，《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2期。
- [9] 宋凤英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贺龙》，《党史纵横》2008年第6期。
- [10] 江和平、岑传理 《见证体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 [11] [15] [41] 李定国 《华侨爱国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6、256、255页。
- [12] 《印尼华侨回国球队抵京》，《人民日报》1953年5月19日。
- [13] 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侨务处 《印尼华侨回国球队情况介绍》（1953），卷号148—目录号2—档案号471。
- [14] 2011年7月16日福州印尼归侨教练林丰玉接受采访时口述。
- [16] 2013年12月2日厦门归侨刘晓征（新中国第一代羽毛球国手）接受采访时口述。
- [17] 杜裕根 《论近代华侨爱国主义的特征》，《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 [18] 福建羽毛球协会编 《纪念福建羽毛球队建队三十五周年 礼赞三十五年特刊》，香港美德印务公司，1991年，第40~43页。
- [19] 侯加昌口述、黄薇整理 《挚爱》，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 [20] 陈媛 《回望与沉思——近代大学教授群体研究（1895—1949）》，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2页。
- [21] 《十单位网球对抗赛》，《人民日报》1962年9月18日。
- [22] 乐正 《从“时间递进”到“空间传动”》，《学术研究》1989年第1期。
- [23] 李亦园 《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第133页。
- [24] 根据香港中华业余游泳联合会网址（<http://hkcaso.org.hk/history.htm>）相关资料整理。
- [25] 《缅甸华侨体育观光团抵京》，《人民日报》1953年8月2日。
- [26] 潭江 《三破世界纪录的黄强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6月13日。
- [27] 洪卜仁编 《厦门体坛百年》，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23页。
- [29] 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编 《青春为祖国闪光》，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第383~385页。
- [30] 时间、张光途 《精神的田园》，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 [31] 福建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 《福建省志体育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0页。
- [32] 《侨生赴沪夺标》，《福建侨报》1959年3月21日。
- [33] 许月云 《侨乡社会资本与侨乡社会体育发展绩效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7~28页。
- [34] 2013年12月2日归侨刘晓征在厦门家中接受采访时口述。
- [35] “习近平赞霍英东申奥贡献，回忆戚烈云容国团”，<http://www.chinanews.com/olympic/news/2008/07-07/1303943.shtml>，2008-07-07。
- [36] 《体坛老将新星畅谈体育战线大好形势》，《人民日报》1979年9月14日。
- [37] 北京电视台体育部和中国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制作 《光荣与梦想——新中国体育50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
- [38] 潭江 《华侨华人与奥林匹克 “中国的贝利”容志行》，《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6月17日。
- [39] 李明欢 《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 [40] 和平、李宗浩 《奥林匹克棒、垒球》，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 [42] 李贺普 《我把祖国比母亲——记归国华侨羽毛球运动员、教练员》，《人民日报》1978年4月17日。

[责任编辑：乔印伟]